

城乡之间: 徽州旅沪同乡会的救乡功能

唐力行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同乡”是联系城乡的纽带,也是城乡认同的符号。寄寓他乡的同乡,关心本土的同乡,家乡的天灾人祸都与他们痛痒相关。徽州旅沪同乡会在其存续的30年间,尤其是抗战以及国内战争期间,都是处于艰难困苦的非常时期。同乡会的救乡除了长时段日常的慈善事业外,更多的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不能出同乡于水火之间,毕竟缓解了同乡的苦难。20世纪上半叶,当乡村自治走向衰落之际,城市自治组织的兴起以及城乡之间的互动,使乡村自治得以维持,乡村社会在动荡中保持着相对的稳定。

关键词: 同乡会; 自治; 徽州; 上海; 城乡互动; 救助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3)01-0111-11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Function of Huizhouese Association in Shanghai
in Rescuing Local Fellows**

TANG Li - x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Fellow villagers” is a tie that links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 symbol of identity recogni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lthough lived far away from home, people from Huizhou concerned about their local fellows, and the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in their home town. In its thirty years’ existence, especially during the most difficult tim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Civil War, Huizhouese Association in Shanghai helped their local fellows not only through their everyday commitment of charity work, more importantly, also through taking unusual acts in unusual time. Although what they have done couldn’t completely solve the problems, their acts eased the sufferings of their local fellow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rural autonomy declined, the rise of the urban autonomy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elpe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ural autonomy and kept the rural society relatively stable in the turmoil.

Key words: the association of local fellows; autonomy; Huizhou; Shanghai;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scue

徽州旅沪同乡会与家乡的互动联系十分密切,歙县旅沪同乡会本身就是救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1922年,歙县山洪暴发,饿殍遍野,歙县旅沪人士方晓之、曹味衡、曹惟明、徐丹甫、程霖生、叶元龙等发起成立水灾赈济会,募款施赈。救灾完毕时,旅沪同乡倡议,将

水灾赈济会改组为歙县旅沪同乡会,以资救乡护侨,于是在1923年成立歙县旅沪同乡会。1929年绩溪旅沪同乡会的建立,也与救乡直接相关。《绩溪县旅沪同乡会征求会员通告》说,“本会自丙寅年(1926)废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开会筹备以来,迄今数年,迭受时局变迁,因此停

顿而未能正式成立”时过三年，“刻为徽州惨遭匪灾竟及四县之多，屯镇尽烬，成为瓦砾，百年难复，如此情况实属不忍目睹。同人等以事关桑梓之利害，巩固团体之精神，联络乡谊补救于万一，徽属六邑独为吾邑缺如，为此通告旅沪同乡未曾入会诸君，统希本月内来会报名登记并补具志愿书，以便定期开会员大会，特此通告。”^①家乡遭遇匪难，使绩溪旅沪同乡痛切认识到建立同乡会是“事关桑梓之利害”的刻不容缓的大事，于是在延迟三年后，绩溪旅沪同乡会终于建立起来。

同乡会重视与家乡的联络。抗战胜利后，歙县旅沪同乡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1946年7月7日召开会员大会选举理监事，11日召开理监事会选举常务理事及理事长，15日即发布《公告：致歙县县政府及各机关团体》^②：

迺启者，本会于抗日战争期间一切会务无形停顿，胜利后即经筹备改组，经于七月七日召集会员大会选举理监事，同月十一日复开理监事会联席会议并选举常务理事及理事长，应行办理各项手续均已依法办理完竣，惟是会务繁杂，嗣后务希时局南针以匡不进，毋任企禱之至。此致

歙县县政府、歙县地方法院、歙县地方法院检查处、歙县县农会、安徽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歙县县党部、安徽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检查处、歙县参议会、歙县商会、歙县总工会、歙县律师会、歙县警察局、歙县救济会、歙县中医公会。

同乡会所告知的单位，都是歙县地方实力部门。重建伊始便急切地要与歙县县政府及各机关团体建立联系，可见同乡会对救乡工作的重视。《公告》可以视为上海与歙县之间城乡互动关系重新启动的标志。

同乡会还注重地方人脉，加强与地方新士绅的沟通和联系。上海市档案馆藏资料中有歙县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方炜平、常务理事曹叔琴暨全体理监事等于1946年7月20日祝贺同乡刘诒燕就任安徽省建设厅长的电文，及8月27日刘诒燕的回电。1947年9月26日歙县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方炜平、监事长曹叔琴、常务理事王杏滋、江笑山、许作人、洪镇康、总干事徐大公致电新任歙县县长杨步梁，在祝贺的同时，提出了革新县政的要求：“遥闻先生出生吾县，旅外同乡咸表欣庆，对于今后县政之革新，铲除社会上的贪污土劣，消灭县治上之民蠹官僚，兴办教育，转移风气，解除民患，以达到建设新歙县之目的，均赋以绝大之期望。且延日匪氛其隐蔽弥漫四乡山区地节，时出骚扰，民不安枕，其患更为可虑，务希钧座一秉军人风度，严厉部署，限期肃清，以清乡闾，而安民心，至为盼禱。”^③

徽州本土也极其重视与上海同乡会之间的联络。

歙县参议会在议决有关县政时，发出歙县参议会公函，事先征询同乡会的意见。歙县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方念谐收到“征求当前县政意见”的公函，被告知1948年12月25日参议会将召开会议，议决三个问题：“A、本县警保队应如何整训补充，B、本县各区乡镇自卫组织应如何□□并补充，C、本县财政应如何整理。”“以上中心议题由会征求各地人士意见，并函请各有关机关先行拟具具体意见于本月十五日以前送会，再由会召集各有关人士举行座谈会商谈，最后提交专委会决定，由全体专门委员向大会提出。”为此，“函各乡镇民代表会、旅外同乡会、地方贤达广征对本县当前县政意见。”并要求“希依照上项决议办法原则拟具具体意见，于十二月十五日前函复过会，以便办理为荷。”^④

“同乡”是联系城乡的纽带，也是城乡认同的符号。寄寓他乡的同乡，关心本土的同乡，家乡的灾天人祸都与他们痛痒相关。商人有财，士绅有势，家乡的救灾、建设，都少不了同乡会的帮助。家乡遇到一些不平事，同乡会也可以利用他们的社会声望和舆论工具，上通中央、省城的政要，施加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弹劾地方上的贪官污吏、不法势豪，发表政见，革新地方，地方恶势力鞭长莫及，也奈何不得他们。同乡会存续的30年间，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以及国内战争期间，都是处于艰难困苦的非正常时期，同乡会的救乡除了长时段日常的慈善事业外，更多的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不能出同乡于水火之间，毕竟缓解了同乡的苦难。

一、为家乡争取和平环境

徽宁同乡会救乡之举，首重家乡的和平环境。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的控制权，虎视眈眈，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1922年皖系军阀马联甲被任命为安徽军务督办，兼署安徽省省长。1923年同乡会获

^①《绩溪县旅沪同乡会征求会员通告》，《申报》1929年5月13日，第5版。

^②《致歙县县政府及各机关团体》（1946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1。

^③《歙县旅沪同乡会和有关单位关于组织成立官员上任等问题的贺电函》（1947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5。

^④《歙县参议会关于征求县政意见和街口筑坝发电问题的函代电和歙县旅沪同乡会关于县政座谈会的新闻稿》（1948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12。

悉马联甲有与卢永祥勾结,参与到皖、直军阀争夺战中去的意图,并“派员来沪与各银行接洽借款等情”。7月,徽宁同乡组织弭兵会,利用在金融界的巨大影响力,向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发出公函,要求他们不要借款给马,以维护安徽的和平。原函^①云:

敬启者,近据报载,敝省督理马联甲应时势之需要,筹备餉械甚亟,最近拟发行兑换券百万元,商同敝省吕省长既胡财政厅,派王、刘二君来沪,分向本埠金融界接洽借款,即以该项兑换券为抵押品云云。迩来谣诼纷起,盛传某将军假道于皖以窥浙,敝省旅沪乡人,正谋所以弭兵之道,爰组斯会,共谋进行。因经济为助乱之源,敝会既有所闻,用敢不揣冒昧,敬恳贵会转致各银行、钱庄勿与敝省长官缔结任何借款,助长内乱,是所企盼,迫切上陈,无任待命云云。

1923年9月3日直、皖军阀争夺上海的江浙战争(或称齐卢之战)爆发。为避免战火殃及家乡,徽宁弭兵委员会派遣代表去蚌埠向马联甲请愿和平,并了解徽宁驻兵与广德屯兵的情况。马联甲一一作了解释。“赴蚌代表吕篙渔报告请愿和平情形。略谓,彼于十二日由沪起程,当晚抵蚌,次日上午十二时,即谒见马联甲,当即呈递公函,并申述此行主旨,马答保境安民乃其唯一职责,贵会爱护桑梓,发为和平运动,适与鄙人平素主张翕合,极端赞同。至徽宁驻兵一节,实无其事,徽宁非用兵之地,绝无驻兵必要。鄙人虽非皖人,然服官皖省有年,已视皖为第二故乡,亦何忍视地方无端蹂躏,且前此据报邻近广德方面,有浙省派驻重兵之说,当经电询卢督办,得其复电,绝无此事,于此可知增兵云者,无非一种调音耳。又谓缔结皖浙和约一事,不知浙人意旨若何,彼个人无不赞同云。嗣宣读马氏复函,词意与上述相仿,经众讨论,对于请愿一事,认为满意,唯皖浙和约是否进行,留待下次讨论。”^②

不久,浙皖和平公约签订,但形同虚设,又传来皖南增兵之消息。徽宁同乡会发出通电,其文如下:

安徽省内外各公团,各同乡会,各报馆,各学校,各乡老幼鉴:窃自上年政变以后,长江数省谣诼迭起。敝会因吾皖居长江腹部,关系非轻,诚恐一旦为野心家所乘,非特一省人民遭其涂炭,恐邻皖省份将联串受其蹂躏,爰于数月之前联合沪上同乡,发起弭兵大会,不惜奔走呼号,请愿和平,虽经缔结浙皖和平公约,而两省人心因之稍定。吾皖当局,亦迭次表示遵守不渝,不图和约之墨迹未干,当局之食言已见,非特皖南增兵之事日有所闻,即证以近日报载,驻蚌第五旅又已奉令调驻广德,而三、五两旅,复各在皖北、繁昌等处,添募重兵。消息传来,曷胜惊骇,用心何在,难测高深。唯是兵凶战危,古有明训,将来一旦祸发,吾民身当其冲,后患隐忧,何

堪设想。况于兹苏浙警讯频传之际,吾皖尤宜处以镇静,以免浮动之心。同人愚鲁,拟贯彻和平初衷,决不忍使皖省卷入漩涡,甘为戎首。所有省军五旅,既为守护地方、保卫人民之用,自不宜无故调防,致起人民警忧。事关桑梓治安,务望吾皖父老兄弟共起直追,为皖民争人格,即为桑梓谋治安幸福,和平前途实利赖之。临电迫切,竚盼好音。徽宁旅沪同乡会叩谏^③。

通电不畏权贵,为了同乡的利益,自由公开地对省政府与军方问责“事关桑梓治安,务望吾皖父老兄弟共起直追,为皖民争人格,即为桑梓谋治安幸福,和平前途实利赖之。”1月27日同乡会发出巩固和平的通电,电文说“同人旅居沪上,体怀乡邦,休戚相关,不忍漠视。惟是兹事体大,胥赖群策群力,务祈全皖父老,一致奋起,共谋桑梓安宁,藉免生灵涂炭,事机危急,稍纵即逝,毋忘切肤之痛,致迫噬脐之悔,则幸甚矣。”^④徽宁同乡会对安徽省政府与军方进行批评与监督,迫使他们不得不重视公众舆论的力量。

1926年11月初,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歼灭了孙传芳的大部分精锐部队后攻下南昌,一部分赣兵逃避于徽宁境内。蒋介石计划借道徽州进兵南京。11月24日徽宁旅沪同乡会联合苏浙皖的部分同乡会等组织和平会,参加者情况为“本埠、外埠团体之加入,外埠团体之表示加入者:徽州旅浙硤石同乡会、芜湖黟县同乡兵差临时救济会、镇江新安会馆、新安苏镇同乡会、广德徽州同乡会、南翔新安同仁堂、无锡黟县同乡会;本埠团体之参加及代表者:徽社(陶行知、程本海),全徽协会(邵之政、徐之松),歙县旅沪同乡会(吴咏霓、吴荫槐、汪渭功),江苏全省典质业同仁会(张澄清),黟县旅沪同乡会(余复白、汪励吾),祁门旅沪同乡会(胡芾之、谢淮卿),黟山青年励志会(余一辰、何懋溪、胡汉三),歙县民治协进会(汪正丞、罗纯夫、许叔良),婺源同乡共济会(俞朗溪、汪维英),休宁旅沪同乡会(朱典生、张益斋)。”^⑤和平委员会于24日开会,申明宗旨“自赣联军陆续退驻徽宁境内后,革命军方面复有派队进攻祁

^①《旅沪皖人阻止皖马借款,徽宁弭兵会致银行公会函》,《申报》1923年8月26日,第13版。

^②《徽宁弭兵会委员会纪》,《申报》1923年9月18日,第14版。

^③《徽宁同乡会对于皖南增兵之通电》,《申报》1924年1月17日,第13版。

^④《徽宁同乡会巩固和平之通电》,《申报》1924年1月27日,第13版。

^⑤《徽宁旅沪同乡会第三届报告书》(1926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 Y4—1—304。

门之消息 战云弥漫 危机四伏,为贯彻年前弭兵主张起见 特组织和平委员会 冀挽劫运。”决定派代表谒蒋,并携带致蒋的信件如下“蒋总司令钧鉴:迭据报载,吾公将进兵祁门,解决皖局,闻命之下,既喜且忧,祁为徽属小邑,不幸已备受兵灾,且徽属伏处深山,民贫地瘠。迩来时有大军过境,供应已告竭蹶,何堪再作战区。乡邦回顾,无限杞忧,渴望和平,同此心理,爰特组织和平委员会 特推代表,诣辕请命,务请俯念民艰,划徽属为缓冲之地,俾人民谋自卫之方,则地方免于糜烂,人民得庆安全。胥出我公之赐,不尽下情,统由代表程君永言面禀,用敢先容,乞赐鉴查。徽宁旅沪同乡会和平委员会叩。”

没过多久,蒋介石回电称,对于徽宁同乡会“执事等关怀桑梓,奔走和平,组织会社,爱护人民,心在乡国”,表示“殊可钦敬”;并对大军借道徽州之举,从“救我国家,解放我民众”的立场出发,指出徽州“民贫地瘠”,“孰令为之,孰令致之?”“为公等告,此实甲仆乙继之万恶军阀,播弄是非之齷齪政氓,以及鼠窃狗偷之土豪劣绅,拜金主义之买办阶级,共同合演之循环战争。而帝国主义者为之牵线,故我伏处深山最少数之民众,亦不得幸免被压迫之痛苦耳。言念及此,可胜浩叹。公等谓体念民艰,正与中正同一心理”,最后劝告说“公等徽宁健者,识见宏通,倘欲营救乡邦,避免战祸,莫如加入革命,实行合作,否则惟望转告徽宁同胞,暂忍一时之短痛,行将解除永久之长痛也。慧直陈词,惟亮察焉。总司令蒋中正叩。”

1929年徽州发生匪祸,3月31日东流人朱富润(朱老五)率部众百余人进入徽州,先后占领祁门、休宁、屯溪,焚烧县署、警署,释放囚犯,4月8日进入婺源界。关于这场匪祸,《申报》大量报道,就中可见同乡会对动乱的应对。《申报》4月8日载休宁旅沪同乡会致“休宁旅沪父老公鉴:迺启者,此次吾休惨遭匪祸,变在仓猝,电信不通,真相难明。兹由本会电请深渡同乡,派人赴休探听确实消息,随时电告本会公布通知,一面函请旅沪同乡庄号,遇有关于地方消息,录送来会,以供众览。特此通告。”“该会于下午一时,得接深渡复电,其文云:匪于昨晚逃婺,桥东烧至镇东阁,成为焦土,被抢数百人,惨无人道。百年难复。”同日,《申报》载《皖人援救梓乡匪祸》报道了婺源同乡会也“开紧急会议,到会百余人,公推郑鉴源主席,行礼如仪,由汪维英报告徽属土匪情形,议决一致电省政府,火速派兵痛剿,一致电县政府商会设法防御,公推郑熙民起草,俞朗溪、俞鉴湖、汪朗周等略谓根本办法非办自卫团不可。散会已万家灯火矣。”相比之下,当天《申报》载徽宁旅沪同乡会的救乡行动更为具体有力“连日因故乡匪患,函电纷驰,昨晚该

会召集会议,除报告休宁、婺源两同乡会开会情况外,并探知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氏适在沪寓,当公推胡复华、吴苍民、汪惟英、张益斋四人,代表赴张氏沪寓请愿。昨日早晨,四代表带公函径诣张宅,当蒙接见,要回杭设法。嗣该会以事机迫切,又决定推胡复华、吴苍民二人,乘下午快车赴杭,再向浙省府面陈痛苦。又该会于前晚接两京代表曹志功、陶行知、潘哲人等来函报告,据谓,五日上午赴三牌楼鹿钟麟次长处未遇,留函而去。下午四时,偕旅省同乡姚文采等,同往国府请愿,适值下办公厅一人来见,即递呈而返。兹将该会昨得各方来电,备录如下:(一)芜湖兵师长复电,上午七点三十分到。(二)徽宁同乡会鉴,敝师已令驻大通三吕团,即日前进,相机痛剿朱匪,知注特复,兵维峻,鱼。(三)安徽同乡来电:休宁、徽宁两同乡会鉴,已请除(众孚)旅,由省昨夜出发入徽,徽准到休,已有代表赴芜请兵师,由芜大雨而入徽,仍盼请公赴浙乞师。金猷,溍叩。”从这一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徽宁同乡会的反应极其迅速,他们分别向浙江省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请愿,并请求驻皖军队派兵进剿。

4月12日徽州旅沪学生会接安徽省府复电“徽州旅沪学生会鉴,余电悉,已派军队由芜湖大通分途驰剿矣。”27日《申报》报道“徽宁会馆收容屯溪灾民”:

屯溪此番惨遭朱匪焚劫,居民流离困苦,食宿无着,若不另觅活路,必致生而待毙。当有詹松堂等大小男女三十五口,由深渡沿徽河乞食来沪,昨早齐赴斜桥徽宁会馆,请求收容。该会馆董事诸君,以谊属同乡,自难漠视。当公推董事朱君焕章,临时指导一切,一面指定徽宁医治寄宿所前进三间为该灾民住所,每日供给蔬饭二餐,且因入夜,天气尚寒,复由朱君设法租得棉被十余条,分假盖覆,以免酿成疾病云。

有感于同乡会在救乡上的重要性,延迟多年未能成立的绩溪同乡会加快了建立的步伐。5月13日《申报》载《绩溪县旅沪同乡会征求会员通告》:

为通告事,本会自丙寅年度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开会筹备以来,迄今数年,迭受时局变迁,因此停顿而未能正式成立。刻为徽州惨遭匪灾竟及四县之多,屯镇尽焚,成为瓦砾,百年难复,如此情况实属不忍目睹。同人等以事关桑梓之利害,巩固团体之精神,联络乡谊补救于万一,徽属六邑独为吾邑缺如,为此通告旅沪同乡未曾入会诸君,统希本月内来会报名登记并补具志愿书,以便定期开会会员大会,特此通告。筹备委员会胡祥钧,程如麒,程克藩,邵锦卿,胡元堂,邵鹤龄,临时事务所在芝众路劳合路底二百三十一号东楼。

各同乡会的救济工作也随之进行。5月20日《申报》各同乡会消息载,徽宁同乡会召开了第五次救济委

员会,其中有“下溪口灾区如何办理由,议决,请将灾民调查后一体办理”;“赈与支配,议决,请将已划上之二万七千元先办急赈,其余俟汇上再办善后”。

二、非常时期的慈善事业

民国年间,社会动荡,内战外侮,民生日艰。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政府借口时局加强对百姓的额外搜刮,徽州百姓面临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诸如自卫特捐、过路捐、难民捐、飞机捐、保甲经费、乡镇办公费、壮丁费、民伕费、救国捐、劳军捐、城防费、勘乱建国费、清乡费等等。民国三十三年(1944)2月,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绥靖总团在屯溪成立。次年开征绥靖捐。先是在征收筵席捐的同时,加征10%绥靖捐。三十七年(1948)年征收烟、土烟、土酒、锡箔等绥靖临时费,从价征收20%。同年又在屠宰税中增收绥靖捐5成。此外,还对“富户”随意征收绥靖税,以致祸及贫民。非常时期,侨居于上海的徽商对桑梓之地的慈善事业,更多了一些时代特色。徽州旅沪同乡会在这一时期为解救深陷绥靖捐之中的本土百姓,作了极大的努力,以下试举二例加以说明。

1947年12月18日,在上海经商的歙县人吴其昌给歙县同乡会一信函,报告其弟弟吴世祯因无力缴纳巨额绥靖捐款而遭拘捕的经过:

其昌世居歙南,在申经营商业已历有年,家无恒产,因是在乡里间只留舍弟世祯一人看守门户。惟舍弟为一成衣工人,赖工资收入苦度光阴,兹于本月十二、十四两日突接乡老由里中来电报二次,据称“日前歙县县政府迫缴绥靖捐未遂,即将舍弟世祯拘押,而后强令缴绥靖捐八千万元云云”。按舍弟世祯为一手艺人,何来如此巨款,即倾家荡产亦难得集此数。谨启者,窃县政府为亲民之官,征收绥靖捐应有一种征收标准,预期公布,使民众有所遵循,不能随意指派,否则绥靖意义何在?几吾同乡如欲任其宰割,将后岂有噍类乎,为此迫不得已恳求贵会诸乡台转电歙县参议会,查明征捐标准或条例,使民众有所遵循,藉可解倒悬之危,不胜感戴,实为德便^①。

县政府居然迫令一个成衣工人交纳八千万元的绥靖费,真是“苛政猛于虎”!吴其昌要求同乡会将他的来函转达县参议院,向县政府施加压力解救其弟,还要求县政府给出征收绥靖费的标准,防止祸及家乡父老。12月23日歙县旅沪同乡会向歙县方念谔议长发出《为函询歙县征收绥靖经费情形并希见复由》的函文,“兹者今据本县旅沪同乡吴其昌君报告,谓其弟(吴世祯,居乡保昌溪文里)习艺裁缝,全赖日常工作为生活。此次县府摊派绥靖经费,竟摊其八千万元,致无力献缴而遭逮捕、拘禁,要求本会电请有关机关声援等由来会。本会因未

明确底细,不预以书面询教县府,然此次歙县绥靖经费,究竟如何筹措,以何种程序为征收标准,曾否由贵会议决通过,抑为县府之见?若果有其事,则烦就近为之化解,以息事端,尚希见复始末,至为感敬,专此,并烦公安。”^②

吴世祯的前事未了,吕耀章的后事又起。事隔4个月,歙县旅沪同乡会会员,原籍歙县安定乡舟川保一甲拾叁户拾叁号的吕耀章给同乡会去函,诉说县府指派其家富户捐800万元,而其家并非富户。两件事联系起来看,很清楚所谓的富户,就是家中有人在上海为商的,被县政府列为鱼肉的对象。难怪县政府是不可能给出一个征捐标准或条例来的,其目的就是让商人家庭“任其宰割”。而十之七八为商的徽州,大多数家庭“将后岂有噍类乎”?!3天后4月12日歙县旅沪同乡会发出致歙县县府及参议会公函,为会员吕耀章无力承担富户捐请求豁免,其文如下:

逕启者,兹据会员吕耀章函称:耀章世居歙县安定乡舟川保一甲拾叁户拾叁号,近接家中来信,谓奉县府指派摊富户捐(绥靖费)八百万元,征收在即,急如星火。耀章现在上海巨成昶瀛记号内任职,月入仅有百余万元,家产亦仅旧屋两间,薄田三亩,家中老幼计有九口之多,入不敷出,生活艰难。自三十年春先父得肺病后缠绵床褥,至三十四年复患盲肠炎症,不治而亡,因之先父生前所蓄尽消耗于医药费用而不足,迄今负债无力清偿。因思政府摊派绥靖费用应以巨富为对象,如耀章者自顾尚且不暇,何能再摊捐款?为特函请贵会转陈歙县政府及参议会主持公道,免于摊派等由到会。查该会员吕耀章确实在沪巨成昶瀛记号内任一低级店员,月薪极薄,负担繁重,所称均属实情,为特代为转请钧府收回成命,准予豁免,以昭公道,至为感荷。此致 歙县县长杨歙县县参议会代理议长江^③

这一回歙县参议会给了回函:

贵会第(100)号公函以会员吕耀章家境清贫,转请豁免缴绥靖捐一案,当经提交本会第五届专门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转县府核办”等语纪录在卷,除抄同原函转请核办外,特先行通知,即希查照为荷。

^①《同乡吴其昌来函》(1947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20。

^②《为函询歙县征收绥靖经费情形并希见复由》(1947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20。

^③《致歙县县府及参议会公函为会员吕耀章无力摊派富户捐请求豁免由》(1948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20。

此致 歙县旅沪同乡会 1948 年 4 月 27 日^①

回函表示“转县府核办”,使事情的解决有了希望。同乡会在这非常时期,帮助着家乡父老,同时也关系着商人自身,共同度过艰难岁月。

内战时期,还有一个群体受到巨大的冲击,即学生。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一书中披露了两个学生群体南下逃难的事实^②。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徽州,皖北长淮临中的学生四百余人南下逃难到徽州,对于学生来说流亡的艰辛固不待言,他们在徽州也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忱接待和安置,但是混杂其间的不良分子却给徽州人带来了灾难,这是龙著所未关注到的。以下是徽州本土的百姓通过在上海的同乡会会员向同乡会发出的求助信,“歙县旅沪同乡会公鉴:案据本会会员吴渤等函称:‘窃会员等故乡之歙县西溪南距屯溪、歙城皆三十华里,民风醇厚,为一朴实农村。去年十一月间,有长淮临中第四分部初中学生四百余人,从皖北流亡南来,告借吴大宗祠、祥里祠、三门祠等处为临时校舍,地方人士对此负笈千里莘莘学子之遭遇,极表同情,举凡需用之校具及必须之设备,皆自动乐于慨捐或借予,对学生之粮食燃料,复尽量供应或资助。岂知半载以来,该校仅上课三次,校长从来未到校,传系作沪上寓公,教员亦不负责人,既不上课,更不管理,任学生终日游荡,其中竟有一部分三十余岁之中年人杂乱其间,冒牌学生,扰民滋事,例举其重大者于下:(一)破坏交通桥梁。村中有大木桥,系屯溪至黄山孔道,为学生砍毁,充作取暖燃料,往来者病涉,交通几至断绝。(二)拆毁文会馆。丰南会馆坐落长虹桥堍,明万历年间所建,为历代文士读书潜修之所,亦为彼等拆毁,瓦砾满地,如历炮火之劫。(三)神主当柴烧。吴氏宗祠之神主牌位,被学生取作燃料,吴氏子孙无法保护。(四)打毁楠木厅。祥里祠大厅梁柱皆合抱楠木,画栋雕栏,堂皇富丽,走廊寝舍建筑亦极宏伟,今多处被学生打毁,残破不可收拾。(五)强奸妇女。有教员郭某、王某及冒牌学生等,竟在青天白日,胆敢强奸吴姓、姚姓、郑姓等数家妇女,虽皆因呼号得救,而从此村中青年妇女皆惶惶不可终日。(六)酗酒打人。冒牌学生终日酗酒闹事,常三五成群强入民宅,强住上房,强索食物或擅入典肆强买物品,一不称心则挥拳打人,白发老翁亦竟遭殴辱。(七)残害农产物。学生除偷鸡盗菜外,更残害农作物,农民所种油菜因采苗遭学生偷窃,收成锐减,食油之仰给大成问题。总之,该部学生之不法情事罄竹难书,其行为较诸败兵盗匪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溪南人士对于该校之热忱换得如上所述人神共愤之事实。恳请贵会赐向旅外同乡呼吁及分电教育主管当局,责令该校校长返歙整顿或迁并雄村高中部上课,既可撙节开支,便于管理,且可使久扰之民,得以昭

苏’等情到会。”歙县旅沪同乡会收到来信后,迅即转呈歙县县政府,吁请解决这个问题。“查来函所述各情,并非虚构,国家办理教育原求培育人材,今该校风如此,殊失国家培育人才之旨,不特虚耗国币而且加害地方,如不速谋救策,后患何堪设想,用此据情奉告,务乞一致声援,以清地方,人民幸甚。徽宁旅沪同乡会叩。”^③

歙县县政府是否迅速解决了西溪南老百姓的问题,限于资料不得而知。但是同乡会的呼吁一定是会引起县政府的重视,并推动问题的解决的。说到底解决问题所需经费大多还是要从歙县旅沪同乡会那里募来的。下面是歙县县政府致歙县旅沪同乡会的另一封公函,所涉及的问题与西溪南相似,可资佐证:

歙县县政府公函 1948 年 2 月 23 日。事由:为呈请救济匪区学生事情函请查照由。县立简易师范本年二月十九日呈称:实属校学生籍贯统计,家陷匪区共计有八十余人,几占全校学生三分之二。本期校依照规定每生应收费用及主副食品折价当在三百五十万元,更加

①《事由:为复吕耀章绥靖捐款事,已据转县府核办,用特先行通知,即希查照由》(1948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 Q 117—27—20。

②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天下杂志 2009 年出版,第 47—49、61 页。该书描述了 1948 年至 1949 年间山东联合中学与河南豫衡联中南逃的苦难场景:“八千多个中学生,全部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组成联合中学,跟着校长和老师们,离开山东的家乡,已经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搭火车时,车厢里塞满了人,车顶上趴满了人,孩子们用绳子把自己的身体想方设法固定在车顶上,还是不免在车的震动中被摔下来。火车每经过山洞,大家都紧张地趴下,出了山洞,就少了几个人。慌乱的时候,从车顶掉下来摔死的人,尸体夹在车门口,争相上车的人,就会把尸体当作踏板上下。八千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只小板凳,上面叠条薄被、一两件衣服,整个用绳子绑起来,夹两支筷子。”就是在这样艰难的逃亡路上,“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通常在寺庙或是祠堂里驻点,夜里睡在寺庙的地上,铺点稻草;白天,每个人带着一个方块土板,坐在庙埕的空地或土墙上,把老师围在中心,就开始听讲。用石灰,或甚至石块,都可以在土板上写字。”“八所山东中学的八千个学生,从一九四八年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时就开始翻山越岭、风雨苦行,一九四九年到达广州时,大概只剩下五千多人。”“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③《案据本会会员吴渤等函称》(1948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 Q 117—27—9。

书籍、零用将达四百余万元。以该生等家遭赤祸之来,尤属无力负担,本属校支出,限于预算,且无基金可挪,鉴于免费生给津贴殊不可能,但以职责所在,又急需抢救,免沦匪化,为呈请务乞拨款救济,核示祇送等情,相应函请贵会应予设法救济,并希见复为荷。此致

歙县旅沪同乡会

歙县县长 杨

发文号数字第 740 号 收文者地址 上海泗泾路 16
收文者 歙县旅沪同乡会^①。

三、弹劾贪黷官员

1948 年是国民党政府走向全面崩溃的前夜。在勘乱总动员令下,政府进一步强化对农村的控制,强行征派农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农村经济和社会更加动荡和破败。农村的吏治极度败坏,贪污公行,把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于徽州乡民来说,最能保护他们权益的除了宗族组织外,就是徽州旅沪同乡会了。旅沪同乡会虽居于中国最大的都会,但是它与本土乡村社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痛痒相关、休戚与共。同乡会在家乡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不仅在于经常捐助家乡的各项事业,还在于它不受家乡政府的约束,反可对其进行监督,乃至上告省府和中央。因此他们发出的公共舆论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据休宁旅沪同乡会《人民团体成立大会报告表》载,民国三十七年(1948)一月四日下午 2 时,休宁同乡会召集抗战后重新成立的大会,出席会议有 355 人。在这次会议上除了选举新的主席、理、监事,候补理、监事外,一致议决“电请休宁县府刷新吏治,严惩地方贪污案。”^②可见,徽州乡村地方官员贪污腐败之严重,已引起旅沪同乡会的高度重视。以下,我们从诸多的旅沪同乡会档案中摘引四段,其中涉及“高级省委人员”田粮处处长、县长、乡长各级官吏,还有军方保卫团。

其一是歙县旅沪同乡会致南京粮食部、屯溪安徽省政府、安徽省田赋粮食管理处、歙县县政府的信函,控告歙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前处长冯迪贪污粮食 37 石,内容如下:

兹据同乡方文斌等来函陈,“窃查歙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前任处长冯迪任内第 495 号临时拨粮凭证计粮谷卅七石,由其亲自卖出,旋曾将该证两次送请该处阅查,对关防、印信等,与冯前处长所签发者一无差异,惟号码涂改无根可对,显见系渠在任内利用职务上之权令,舞弊欺诈乡间善良百姓之财务,经文斌等具状歙县地方法院依法检举后,冯迪竟屡传不到,闻已畏罪潜逃。为特据情函请贵会主持正义,代为分电各有关当局澈查贪污,以清吏治”等情到会。查歙县田粮处冯前任处长为

高级省委人员,竟敢藐视法纪、欺诈舞弊,本会以救济同乡、服务桑梓为目的,特电函请钧府、部、处迅赐查办,以维法纪而安乡间,曷胜感禱。

歙县旅沪同乡会卯(冬)叩印^③。

其二是歙县参议会给歙县旅沪同乡会的来电,控告歙县前县长杨步梁“藉剿匪名义赴乡骚扰”,“搜括民物,强拉壮丁,残杀良民”等罪行,要求同乡会“一致主张”,向各级政府发出呼吁,以“查明严惩”。电文如下:

歙县旅沪同乡会勋鉴:查本县杨前县长步梁在任期间屡藉剿匪名义率队赴乡搜括民物,强拉壮丁,残杀良民,经过村镇莫不蒙受其害,以致怨声遍野,民不聊生,离任时复公然携走武器,迭据本县双溪、大源、梅溪、黄山等乡被害民众检举陈报被害情形,吁请伸张正义,转请曾峰追究依法惩办等情到会。当提经本会第六届专门委员会讨论,全以戡乱期间骚扰掠取民财,殊属有违国家法纪。本会职司民意,当应作正义之呼吁,以慰民心而利戡乱,当经决议“抄件转请监察院、省政府、省参议会查明严惩并分电各旅外同乡一致主张等语”,纪录在卷,除携走武器经大会决议组会清查册报并分电外,特抄同被害人原件,电请查照惠予一致主张并希见复,至为公感。

歙县参议会会议长方念谐 六专议民戍(养)印 计抄附被害人陈报原件^④。

其三是有关乡长韩荣辉“加害乡村”的三封信函,一是歙县旅沪同乡会会员汪发达 1948 年 6 月 18 日给同乡会的信函。汪发达在给同乡会的信函中详细介绍了歙县安定乡乡长韩荣辉殴打其父的“凶横劣迹”,请求同乡会“发快邮代电转请本县县政府赶紧善为遏止,或派员前往彻查”。其信函可见当时徽州乡村吏治的黑暗:

逕启者,窃会员之父志浩祸源于前月二十五日,被安定乡乡长韩荣辉纵令队兵强取鸡只食物,家人出而拦阻,奈蛮不讲理,逞凶胡乱殴打。经家父赴乡公所申诉,詎乡长不加约束,反恃势漫骂殴打成伤,比经邻人恳求释回。惟伤势所在,心实不甘,当赴本县地方法院检察

^①《为呈请救济匪区学生事情函请查照由》(1948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 Q117—27—20。

^②《人民团体成立大会报告表》(1948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社会局档案 Q6—5—1039。

^③《为同乡方文斌等电请澈查歙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前任处长冯迪贪污舞弊由》(1949 年 4 月 2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 Q117—27—10。

^④《为据陈本县杨前县长步梁藉剿匪名义赴乡骚扰情形电请查明核办示复由》(1948 年 11 月 22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 Q117—27—10。

处请验伤痕,控诉在案。嗣奉传票于本月八日庭讯,家父如期入城候审,不意在中途被韩荣辉派队兵截获,持枪威吓绑架至棉潭小学内,紧闭三十三小时,迫令具悔过书并加以私藏军火罪名,勒令撤捺指印。当时不由分辩,竟肆虐倍至,滥施殴打,身受重伤。其凶悍情形家父复二次申诉法院验伤之后,蒙庭谕拘传韩荣辉到庭裁判,自应静候法办,但该乡长凶横劣迹昭彰,深恐别生毒计加害乡村,殊于地方治安颇有隐忧,且前次徽州日报已载有肇事详情,谅早为各界所鉴,及而今迭接家书,所述各情均系实在。暗无天日,受冤害难堪。会员因羁旅在沪不能代父营救,深感惶急,为此备函具陈,仰乞贵会鉴俯赐主张正义,请发快邮代电转请本县县政府赶紧善为遏止,或派员前往彻查,如果该乡长藐法不恤,务望迅除横暴藉维地方治安,不胜盼叩禱之至。此上歙县旅沪同乡会 理事长方 诸乡长钧鉴。

会员汪发达谨上 六月十八日^①

二是同乡会应汪的要求,在接信次日便给歙县王县长发去信函,表示“本会获悉前情难安缄默,为特电请钧府处依法严惩,以维法纪而安民命”。其函如下:

歙县县政府王县长、地检处首席钧鉴:案据本会会员汪发达本年六月十八日函称(照叙原文)等情。据此,如安定乡乡长韩荣辉果有此举,是属非法,被害人汪志浩既已控诉于法院,自应静候法律制裁。余以该乡长一再凭藉职权,横征乡民,前既强占民房,今又复行强暴,于兹行究伊始不宜有此专制虐民作风,尤在此戡乱时期更应争取民心,庶不致授匪徒以宣传之口实。本会获悉前情难安缄默,为特电请钧府处依法严惩,以维法纪而安民命,特电奉驰,尚系惠复。

歙县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方炜平叩^②

三是王县长回复同乡会的信函。王县长得信后作了处置,于七月解除了乡长韩荣辉的职务,令他“静待司法裁判”。安定乡乡长一职另派人接替。事情得到较为完满的解决。

歙县旅沪同乡会公鉴:贵会(37)已养快邮代电敬悉。查汪志浩指控安定乡乡长韩荣辉各节,前据该汪志浩呈诉到府,比以该案既拟向法院控诉,应候院方依法解决。曾飭该韩荣辉遵照应讯,一面以该不洽舆立,将其另调职务,使静待司法裁判,一面并转飭该受深渡联防区署据实查复,以明真相。所遗安定乡长一缺另派张炳昌接充各在案。准电并囑相应电复,即希查照为荷。县长王^③。

其四是向军方控诉保卫团的劣迹,公推同乡洪敦遗君代表本会请愿。1948年10月13日同乡会致电时任衢州绥靖公署汤恩伯,控诉在歙县担任剿匪工作的保卫团和歙县自卫团“军风纪极为恶劣”,列举了他们的名为

剿匪,实则为匪的行为“如遇匪警绝不延路痛击,从速放枪声,迨匪退出方长驱直入,以搜匪为名,实行其掠虏奸淫故技,向地方要粮要鸡鸭酒肉等件,一不随意,即冠人民以通匪罪名”,“名为驻防,实则终日赌博,吃喝皆须由人民供给,扰民为事,何尝有裨戡乱。”同时,同乡会还控告了现任王县长“王县长取宽厚,基政则腐败不堪,此为任用私人之果,如税收机关故意留难,往来船只商车擅收课外小费,使土产不能畅流,在杭徽公路之三阳坑收税机关,恒有大头小尾之弊,据十月九日徽州日报载有两车蜜枣,实收税为四亿五千万,而缴库则变为一亿八千万,又征收民众税,从不给收据,贪污中饱,事实俱在。”请求汤恩伯“派兵进剿”,而“将保卫团撤调他处施以训练”。提出“治本之道则在训练行政干部人员,罗致优秀青年及民孚众望之士绅,分别担任县政或参议队工作,澄清吏治,根绝贪污,健全保甲,办理组训宣传等事”。^④同乡会致汤恩伯电文透露了希望由“优秀青年及民孚众望之士绅”担任县政,以救歙县百姓于倒悬之苦的政见。

徽州旅沪同乡会本着“以救济同乡,服务桑梓”的目的,弹劾贪黷官员,他们依托其社会网络、自办的报刊和强大的人脉,“分电各有关当局彻查贪污,以清吏治”,给本土地方官施加压力,或多或少地减缓了百姓的苦难。

四、关注桑梓经济建设

抗战胜利后,徽州旅沪同乡会在关注桑梓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二件:一是敦促政府修复杭徽公路;二是响应歙县参议会的号召,向各级政府发出电文,就街口建坝农电工程这一事关本县新安江沿岸人民生存权益的大事,呼吁国家“预筹街口以上沿河人民生活”。

^①《会员汪发达来函》为父遭受该乡乡长韩荣辉殴打致伤已状诉地方法院并请分别函请县府及地院申援以维法纪而安民命由》(1948年6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10。

^②《致歙县县政府王县长地检处首席代电》为安定乡乡长韩荣辉非法虐民,据情特请严惩以维法纪而安民命由》(1948年6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10。

^③《歙县县政府来电》为准电以汪志浩控诉安定乡乡长韩荣辉一案复请查照由》(1948年7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10。

^④《致汤恩伯主任代电,为请派兵至歙清剿以完成戡乱之基由,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十三日拟稿》,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9。

1. 修建杭徽公路。徽州四围皆山,自古以来就不利商业交通,而“百货皆仰于外”^①的徽州,又有赖于商业为生。民国八年,徽商吴日法曾说“惟吾徽道途梗阻,交通乏便,……吾徽之由陆路旅行者,东则有大都之固,西则有浙岭之塞,北则有黄山之隘;由水路旅行者,则东涉浙江,滩险三百六十,西通彭蠡,滩险八十有四。经历险阻,跋涉山川,糜费金钱,牺牲时日,旅之往来,殊非易事。前所云三年一归者,且有历数三年而来一归之商人,并有避此困难而移家于外者。”^②改善交通以利商业和民生是“吾民所为望泽者,岂不急急哉”!^③

据《申报》民国十三年(1924)5月17日的报道,“徽宁旅沪同乡会 昨开理事会”。会议讨论了“促进徽宁长途汽车案,由汪禹丞报告此案经过。略谓皖浙长途汽车,前经吴蝶卿、李达孚诸君发起筹办,因经费浩大,以致中止,前由会员朱其光提议,要求本会提倡,早经评议会议决,交由本部筹办,究竟如何进行。请众讨论,经曹志功、程永言、许筱甫、李振亚等先后发言。结果,定期宴请二属关心实业交通之同乡,共商进行办法,以期早日实现,议毕散会”。可见交通已成徽商实业发展的一个瓶颈,也是改善徽州民生的第一要务。清人赵吉士之“急急哉”,也是全体徽商和全体徽州老百姓之“急急哉”!这次理事会披露了徽宁同乡会早已着手筹备皖浙长途汽车,并开始促进徽宁长途汽车。通车的前提就是修路,但是“经费浩大”,一时难以实现。

20世纪30年代,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徽州旅沪同乡会的呼吁有了回应。1932年6月,安徽省交通厅组织测量队对抗徽公路皖境昱岭关至霞坑段进行了测量,先后施测了2条路线。经过比较后,决定选用沿溪线。其中沿途杉树岭、中岭、驼岭的越岭线多次采用回头曲线、展线降坡迂回通过的测量方法。1933年10月25日徽杭线歙昱段(歙县至昱岭关)通车。11月26日徽杭线全线通车^④。从1932年至1933年底苏、浙、皖三省省际公路,即京芜(南京—芜湖)、宣长(宣城—浙江长兴)和杭徽三条省际公路先后通车,大大改善了徽州的交通,便利了徽商的经营,促进了徽州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为阻止日本侵略军进入徽州,徽杭公路被徽州军民主动破坏。

抗战胜利后,1946年8月21日歙县旅沪同乡会分别致电安徽、浙江两省建设厅,请求修复徽杭公路,两封电文如下:

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刘钧鉴:窃维欲图国家强盛,文化、教育、军事、经济、交通,缺一不可。我国于事变前,铁道、公路几遍布全国,后以抗战军兴,因战略关系,不得已大都自动破坏,杭徽公路是以遭遇同一命运。兹

者国土重光,政府力谋建设恢复交通,惟对于杭徽公路则尚未顾及,致商旅运输至感不便。皖浙两省商业因而影响颇巨。本会有鉴及此,用特电乞迅与浙省当局会同恢复,以利商旅,而增国库收入,曷胜企禱之至。

歙县旅沪同乡会叩 皓

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皮作琼:窃维建国图强首重交通。在事变前国省县道经营几遍全国,徒以抗战军兴,特因战略关系每多自动破坏,杭徽公路不能例外。乃此河山光复,政府正谋建设恢复交通,惟对于杭徽公路尚未计及。皖浙两省商业频繁,长途跋涉运输每感不便,为此电请钧座会同浙省当局迅予恢复,以利交通而惠商旅,不胜翘企之至。

歙县旅沪同乡会叩 皓^⑤

两通电文原本是一样的。歙县旅沪同乡会总干事徐大公亲自在给浙江的电文上作了修改,修改稿上有“用此稿,大公报”的批语。可见歙县旅沪同乡会对修复杭徽公路的高度重视。

9月4日浙江省建设厅回复歙县旅沪同乡会如下:

批具呈人歙县旅沪同乡会:本年八月二十一日歙字第十一号代电为请迅予恢复杭徽公路,代电里查杭徽公路系由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一区公路工程管理局方设法积极办理此案,前据该省七区商联会驻屯事务所电同前情,即经转电第一区公路工程管理局核办在案,据呈前情,仰即先照^⑥。

9月7日安徽省建设厅回复如下:

歙县旅沪同乡会:本年八月二十一日代电东系,查徽杭公路划归国道路线,系属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一区公路工程管理局管辖范围,所请恢复徽杭交通,可径向第一区工程局申请,复合电知。安徽省建设厅交,申冬^⑦

在第一区公路工程管理局的经管下,杭徽公路于次

^{①③}丁廷榘修、赵吉士纂:康熙《徽州府志》卷8《踳贩》,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

^②吴日法《徽商便览·缘起》。

^④何警吾主编《徽州地区简志》,黄山书社1989年版。

^⑤《为呈请浙江、安徽建设厅修筑杭徽公路以利商旅由》(1946年8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13。

^⑥《浙江省建设厅函复已代转第一区公路管理局修复杭徽公路由》(1946年9月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Q117-27-13。

^⑦《安徽省建设厅代电复本会请求修复杭徽公路由》(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七日),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档案馆藏,Q117-27-13。

年抢修完工,重新通车。1950 至 1952 年杭徽公路又进行修整,拓宽路面。徽州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为畅通。

2. 建言街口建坝农电工程。1948 年,经过国家资源委员会与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组合勘测钻探,计划在歙县街口筑坝建设水电工程。街口筑坝将大大提升新安江的水位,严重影响徽州乡村的社会生活。11 月 18 日,歙县参议会向歙县旅沪同乡会等发出《为街口筑坝农电上电中央各院会暨各地歙同乡会分电呼吁正名及预筹街口以上沿河人民生活》的通电,电文如下:

上海歙县同乡会公鉴:顷上立法院、监察院、行政院水利部资委会、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浙江省政府省参议会、安徽省政府省参议会并分电全省各县各议会、各地同乡会、南京新安江水利建设促进会电一通文曰:“查本县街口建坝农电工程,业经此一关系东南各省暨京沪两市发展轻重工业之动力源泉,与夫便利新安江沿岸地区灌溉防洪运输之伟大工程。各人憧憬于美国田纳西河水坝人力控制天然之远景与温习其十余年发展繁荣之历史,谨以万分愉快之情绪迎接此一工程之早日完成,俾东南工业革命开全国工业建设之先驱。惟是工业建设之初,利害不无互见,有害在一隅而利溥各地,有害局于一时而利可垂百世。能稍减一分灾害范围即为再□□一分培养元气。查口水坝高度达八十公尺,水位经常保持六十公尺,水库尾间达及上游,距离街口水程一百余华里,沿江夹岸虽高峰耸峙,而一路未汇之支流之多,即分水岭所在多有支流,其坡度地形又未足,均高于八十公尺,而主流支流所经地区,无不属于歙县,屋宇栉比、星罗棋布,为县属人口最密度区域。侧闻新安江水位平均都在三十公尺,折合市尺拾为十丈,深渡以下至街口五十华里,距离愈短水位愈高,新安江岸高度高者二三丈,低者一丈余,霉季山洪陡发,水文有其最高限度尚难免于冲毁田园,漂没人畜,将来水库水位数倍于霉洪,以新安江江岸之□□□分水岭之沟通支流上游低洼地区则淹没范围之广,为数将达一万市亩。歙县丛山栉□、地瘠民贫,沿江地区经济尤为□□,人民聚族而居,力耕而食,祖宗庐墓所在,习俗安土重迁,一旦毁其田园,摧其职业,强令其抛弃世守之乡土社会,使十万男妇老幼□□□□,流离四方,以供水库以外地区人民换取电化之亲□,不能谓非一严重的整个社会问题。歙县人民同属国民一份子,深知大建设进程中不能不有破坏,况□此举世盛倡水力发电之日,自不许与科学逆流越趋反顾,然而此一百余华里地区之十万人究因建筑水坝而牺牲,似宜于动工之前夕熟为筹划。吾人深知国家工业建设必以兼筹并顾、利溥全民为前提,本会所以不能已于言者,盖以京沪杭报纸所载建坝计划,估计需款美金二千六百余万元,经费筹措大部有待于美援,实

则美援数额有限,就令如愿以偿亦仅敷建坝之用,而受灾害地区十万人之(一)如何选择地区集体移村,并注意如何适应被迁人民之生活习惯;暨(二)如何补偿被淹田园之等值,使无争议;并如何限期由国家重建房屋供其居住,如何重□耕地、资本、种子、牲畜迅速恢复其生产能力,如何扶植其他各业人民与夫依赖田园租息收益人民之迅速就业,如何救助不能耕作之老弱妇孺,使无冻饥以迄于;(三)如何协助集体□□迁移时之交通工具及其食品卫生诸端其事至繁,需款至巨,但并未闻列入□□,不能不深疑惑。本会代表人民职司言责。业经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除筹组歙县新安江水利建设协进会外,用敢环电请命,伏乞采及□□—转飭当局会同本会及地方政府深入被淹地区精密调查,通盘筹划,妥为□□,俾于电化东南前途,不使歙县人民流离失所,岂谨本会之幸而已。复次口水坝水力发电量计划为八万千瓦,本县及本省各县地方经济不丰,有待于轻工业之开发与农田水力之改革,而动力为一切工业农业之母,将来水力发电之时,本县及本省各县斟酌地方工业动力农业灌溉之实际需要,自应优先保留适足电量以符皖电济皖之主旨。抑有陈者,街口为新安江地区,邑乘斑斑可考,盖新安江发源于旧徽州府属之六县,其上游出自婺源、祁门、黟县、休宁在屯溪汇合者名浙江;出自绩溪、歙县在歙县西门外太平桥汇合者名练江;浙、练二水在歙县朱家村汇合为新安江,迤迤迤于浙江严州(建德),仍沿用新安江名称,严州以下再汇合婺港为富春江,至杭州出海。始原钱塘流域浙江之旧钱塘县以此得名。钱江潮尤为全国皆知。而夹岸峰峦,水浅湍急之新安江,街口相距钱塘潮头六百余华里,其非钱塘江流域显而易见,矧严州以上,“学名”咸为新安江。未来口水坝之名称似不能上下游创置冠以钱塘或浙江二字,以启今后地理学家聚讼之藉口,自应正名为皖域新安江水力发电所,今后筹备工作并应会同本省地方政府及地方团体共同办理,以正视听。并此附陈“敬乞鉴登临电毋任屏营待命之至”等语。事关本县新安江沿岸人民生存权益,特电本陈,敬恳一致主张,分电呼吁,毋任企盼。歙县参议会议长方念谐叩 戊卯①

电文告诉我们以下三点:一是徽州百姓有着博大的胸怀。他们对于在歙县街口筑坝农电这个将严重影响当地百姓生活的工程,是怀着“万分愉快之情绪迎接此工程”,认为这是一个“伟大工程”,将为“轻重工业之动

①《为街口筑坝农电上电中央各院会暨各地歙同乡会分电呼吁正名及预筹街口以上沿河人民生活》(1948 年 11 月 18 日,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旅沪同乡会档案 Q117—27—13。

力源泉”,“便利新安江沿岸地区灌溉防洪运输”。二是客观地指出“惟是工业建设之初,利害不无互见,有害在一隅而利溥各地,有害局于一时而利可垂百世。能稍减一分灾害范围即为再□□一分培养元气”。如何保障一百余华里地区十多万人民的生存权益?如何稍减一分灾害?电文提出三点:即如何选择迁移地点?如何补偿被淹田园之本值?如何保证集体迁移时的交通食品卫生等等。三是徽州人民作出重大牺牲,将来在工农业用电上要优先供应安徽本土,而街口在徽州,新的水利工程应正名为皖域新安江水力发电所。第二三点都是合情合理的。歙县旅沪同乡会及各地歙县同乡会都一致发电呼吁,形成强大的舆论,迫使当局认真对待。

由于国内战争的迅速发展,这一工程并未付诸实施。解放后,1957年新安江水电站开始兴建,到1960年完工发电。建坝的地址向东移至浙江淳安。淳安县城被淹没在水库中,形成千岛湖。1957年至1960年,国家在建设新安江水电站期间,动迁移民30.6万人,其中后靠安置7.9万人(淳安4.3万人,歙县3.6万人),远迁安置22.7万人(安置在浙江省12万人、江西省10.7万人)。歙县参议会与旅沪同乡会在1948所说的“沿江地区经济尤为□□,人民聚族而居,力耕而食,祖宗庐墓所在,习俗安土重迁,一旦毁其田园,摧其职业,强令其抛弃世守之乡土社会,使十万男妇老幼□□□□,流离四方,以供水库以外地区人民换取电化之亲□,不能谓非一严重的整个社会问题。”30万移民远远超过当年预计的10万,更“不能谓非一严重的整个社会问题”。我们不知道迁移之前夕是否为移民“熟为筹划”?当年电文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是否应验在他们身上?然而我们对于这批“失声”移民之命运所知太少了^①。

从上述四个方面救乡的内容看,这些有关徽州大局上的问题,决不是单靠小徽州的力量所能解决的。同乡会的成员包括了政界、商界、学界的名人,他们既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更有热心桑梓的社会责任感。同乡会在20世纪前叶充分展示了民间社团的社会功能。城市自治组织与乡村自治组织相互呼应,大徽州与小徽州良性互动,使徽州本土与在外移民携手

共度艰难时世。20世纪上半叶,当着科举废除,乡绅大量离乡,乡村自治走向衰落之际,城市自治组织的兴起以及城乡之间的互动,使徽州乡村自治得以维持,乡村社会在动荡中艰难延续。

(本文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项目,编号为SJ0703。)

作者简介:唐力行(1946—),男,江苏苏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方英

^①目前仅见上揭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第14页载“三十万淳安人,为了‘国家’整体的进步,必须迁走。一个个村子化整为零,一个个大家族被拆开,从薪传千年的家乡土壤发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穷乡僻壤。结果就是,到了任何一个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当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语言不通、形容憔悴、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了。家里没有一张八仙桌可以带得出来,也无法跟当地冷眼瞧着你的人解释‘嘿,我家喂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诗书传家’为荣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满腹辛酸,沦为困顿褴褛的新移民,又从刀耕火种开始。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没离开淳安,她就会和她今天仍旧思念的爸爸妈妈,还有她自己的孩子,经历被迫迁徙这一幕:谏村是淳安远近闻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户,八八三人,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粉黛青瓦,雕梁画栋。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们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柜收购只给一元二角八分钱。一张柏树古式八仙桌只卖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迁的那天,拆房队已进了村,邵百年的母亲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着不肯走,拆房队绳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栋梁,几位拆房队的人把这位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房子也就顷刻倒下了。”